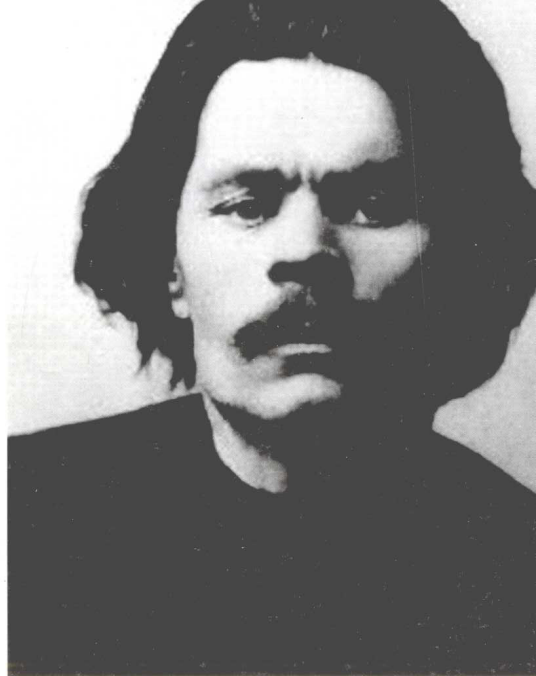


花城
译丛




Несвоевременная мысль

不合时宜的 思想

〔俄〕高尔基 著
余一中 董晓译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Maxim Gorky, showing his face and shoulders. He has long, dark hair and a prominent mustache.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 textured grey.

不合时宜的 思想

(俄) 高尔基 著
余一中 董晓译

Несвоевременная мысль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合时宜的思想 / (苏) 高尔基著; 余一中, 董晓译.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0. 6
(花城译丛)
ISBN 978-7-5360-5612-1

I. ①不… II. ①高… ②余… ③董… III. ①政论—苏联—文集 IV. ①D751.2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10970号

责任编辑: 林贤治 胡雅莉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3.625 1插页

字 数 270,000字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定 价 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译序

余一中

在我国，提起高尔基，几代受过义务教育的公民都知道，他是俄国的大作家，是《海燕》、《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母亲》等经典文学作品的作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更是把他称作“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无产阶级文学和苏联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的名字是与“革命的海燕”、“列宁的挚友”等形象紧密相联的。然而在1997年之前的80年间，又有多少中国人知道高尔基曾写过《不合时宜的思想》这样一本书，异常激烈地反对过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①，尖锐地、指名道姓地批评过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的政治主张呢？同样，在1988年前的苏联，也几乎没有人读过《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因为这本书在苏联从来没有出版过。

然而这并没有妨碍苏联文化官员、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



们几十年间在著作中，在课堂上“义正辞严”地批评十月革命前后与苏俄初年高尔基的“错误思想”与“政治上的迷惘”，尽管他们本人也大多没有机会阅读《不合时宜的思想》。当然，这种情况在苏联并不是什么稀罕事。1956年，帕斯捷尔纳克因《日瓦戈医生》一书受到全苏大规模的批判与声讨时，批判者和声讨者们基本上也都没有读过《日瓦戈医生》。

1988年，莫斯科的《文学评论》杂志发表了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之后，苏联人，继而在1997年中国人才得以知道高尔基在与列宁的论战中到底说了些什么话，表达了怎样的思想和感情。今天，在花城出版社即将再版拙译高尔基的名著《不合时宜的思想》之际，我觉得有必要向读者诸君介绍一下真实的高尔基，即高尔基为什么会在十月革命即将到来和蓬勃展开的时候，“突然”向世人展示出他“反革命的另一面”，十月革命后他又是怎样对待自己在十月革命时期的“错误思想”的。我想，在对这些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之后，我们才可能更好地理解《不合时宜的思想》这一高尔基的重要著作，也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高尔基的一生。

高尔基出身贫寒，幼时丧父，童年寄居在外祖父家里时，不断受到对俄国人来说非常屈辱的穷亲戚的待遇；10岁时他就独自到人间闯荡，深切地感受到世态炎凉；青年时代他走遍了伏尔加河流域，漫游过欧俄大地，在他称之为“我的大学”的社会里饱尝艰辛，历尽磨难。壮丽的俄罗斯大自然和慈祥而善良的外祖母、正直而坚强的革命者罗马斯和卡留日内依、律

师拉宁、作家柯罗连科等人塑造了未来作家热爱美，主张社会公正，向往光明、幸福的心灵；社会的阴暗、生活的苦难不仅未能摧毁高尔基对未来的信心，反而磨练了他的意志，增强了他改变自身与人类命运的决心。1892年，高尔基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1898年，高尔基出版了他的两卷本《随笔与中篇小说集》，成了俄国的著名作家。此后，他的散文诗《海燕》、《人》，剧本《在底层》，长篇小说《母亲》，中篇小说《童年》、《在人间》等作品与他积极的社会活动（领导“知识”出版社与“帆”出版社的工作，主编《年鉴》杂志，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以及被逐出境等），使他的文学声望与社会声望与日俱增。到了1910年代，在列夫·托尔斯泰逝世之后，高尔基已经成为俄罗斯社会的良心，成为俄国在世界文坛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1917年初，俄国在经历了1905年革命后的沉寂时期之后，迎来了新的革命形势：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改良早已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中断，连续近三年的战争耗尽了俄国的国力，皇室专制，政府腐败。这一切导致了军事上的屡次惨败，民不聊生（连首都彼得格勒居民的面包供应都成了问题）。社会大动荡、大变动已迫在眉睫。然而后来被称作高瞻远瞩的革命领导人们却对此毫无感觉。列宁在二月革命爆发前两个月从苏黎世寄给其党内友人的信中甚至写道：“我们这些老人可能活不到未来革命的日子了。”

是年3月8日（俄历2月23日），首都彼得格勒的居民走上街头举行反战反饥饿的大游行，临时组成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因势利导，推波助澜，使反战反饥饿的群众游行发展成为反对沙皇专制的革命，这就是著名的二月革命。不过，“无论是在瑞士的列宁还是在西伯利亚流放地的斯大林，无论是在美国的布哈林还是托洛茨基——总的说来，无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他们的同路人没有参与这些事件。”当代非常推崇斯大林的俄国传记作家尤·叶梅里扬诺夫如是说。

二月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摧毁了沙皇专制。3月15日尼古拉二世逊位，二月革命宣告胜利。由于当时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占大多数的代表来自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与社会民主工党的孟什维克派，他们认为这时的俄国革命还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理应由资产阶级领导，而鉴于苏维埃没有执政的经验，他们宁愿通过具有政治活动经验的二月革命中匆忙成立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管理国家，于是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就演变成了临时政府。

高尔基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曾长期侨居西欧。这期间，他一面奋力写作，一面积极鼓吹俄国革命，学习西欧无产阶级的革命经验，并因此更加笃信社会民主主义。1913年结束侨民生活从意大利回到俄国后，他用巨大的精力组织与领导《年鉴》杂志和“帆”出版社的工作。在他看来，组织作家出版社，传播知识与文明就是在与沙俄的黑暗专制作斗争，就是在做迎接革命高潮的工作。二月革命爆发后，高尔基兴奋无比。

二月革命胜利后，他欢呼俄国人民“与自由结婚了”。俄罗斯科学院恢复了他的名誉院士称号。他积极参加文化组织工作，呼吁临时政府与俄国社会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尊重俄国人民的创造性劳动，他期盼着新的时代出现新的伟大人物，期盼着新俄罗斯国家的繁荣与昌盛。

二月革命的胜利给沙皇统治时期的政治犯带来了自由，他们纷纷从国外或西伯利亚等流放地赶往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列宁也取道德国回到了彼得格勒。他在踏进彼得格勒的当天夜里就发表演说，呼吁立即结束战争，要求社会民主工党的布尔什维克派不失时机地“在最自由的国家里”发动第二场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这演说就是所谓的“四月提纲”。

起初，列宁的主张不仅遭到了临时政府和其他革命政党的反对，而且也遭到了社会民主党内的同志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等人的反对，甚至也遭到了斯大林、加米涅夫、加里宁、伏龙芝、捷尔任斯基等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反对。高尔基出于其革命者兼知识分子的真诚，自1917年5月1日（俄历4月18日）起在他任主编的《新生活报》上连续发表文章，力图运用其作为无产阶级作家、“革命的海燕”、“俄国社会的良心”等在民众中的崇高声望，深刻睿智的自由思考与振聋发聩的文学政论语言，来矫正临时政府施政中的错误，力挽群众自发势力的狂澜，制止激进革命者的过火行动。这些文章的专栏名称即为“不合时宜的思想”。在撰写这些文章时，高尔基显然铭记着两位前辈作家的榜样：一位是尼采，另一位则是陀思妥耶夫

斯基。这两个人都是“反潮流”的勇士。高尔基是俄国最早的尼采思想接受者之一。当年，尼采在他批判大卫·施特劳斯、弘扬叔本华与瓦格纳的思想时写下的《不合时宜的思考》一书最初的俄文译本就叫做《不合时宜的思想》。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半个世纪前作为“俄国社会的良心”在他定期出版的《作家日记》中既不畏强暴，愤怒抨击欧洲资产阶级、俄国沙皇制度及其社会基础，也不顾民主阵营昔日友人们的不满，直言不讳地批判俄国人民自身的弱点与丑陋，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指出社会的进步应重在改变人的心灵。

高尔基的言论自然引起了列宁的不满。应当指出，在十月革命前，作为作家、社会活动家的高尔基在俄国民众中和世界舞台上享有比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的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高得多的声望。也正是因此列宁格外珍惜与高尔基的友谊，珍惜高尔基及其创作对俄国民众与世界进步人类的巨大影响，珍惜高尔基为革命政党募集资金的能力。在列宁与高尔基生前，他们之间是平等、自然的朋友关系，而并不是所谓“英明领袖”与“糊涂作家”间的主从关系。我们之所以说二人是平等、自然的朋友关系，是因为这两个人物都有其各自的个性，且人格上也无高下、尊卑之分，他们意见投合时亲密相处，愉快合作，意见相左时则各抒己见，互相讨论，甚至激烈争吵。例如，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会议期间，列宁在紧张工作之余常常去看望高尔基；在高尔基侨居意大利卡普里岛时，列宁曾两次专程赶到高尔基住处看望他，两个人一起议事，休息。

而当高尔基与波格丹诺夫、卢纳察尔斯基一起办党校时，列宁耐心地劝阻他，还严肃地批判他的“造神”活动。同样，当列宁一以贯之地在党内组织与加强布尔什维克派别时，高尔基却大不以为然，认为他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同志是“拉帮结派者”，他们的派别活动有害于党的统一与团结，因此也不利于革命事业；当列宁颇为自信地写完《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将它寄给高尔基并希望在高尔基的“知识”出版社出版时，高尔基却因对该书的评价不高而拒绝出版之。高尔基同柯罗连科、安德列耶夫、勃洛克等人，列宁同布哈林、斯大林、加米涅夫等人，都有过意见分歧、思想争论，甚至口头争吵，但他们又都能与自己的同行、同志友好合作，协调共事。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所谓与领袖思想不一致就是“反对领袖”、“反对革命”，就是大逆不道，就应当或认错谢罪，或被彻底打倒的观念，只是斯大林个人迷信时代“以人画线”的制度形成后才流行起来的。

列宁在明确自己的战略目标——发动新一轮革命之后，就以其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和灵活多变的策略手段，说服战友，宣传民众，扩大同盟者的队伍，积极地准备行动。与此同时，临时政府的决策连连失误（坚持将世界大战打到底，实行国家粮食专卖、拖延土地问题的解决，等等），使其威信大减，民心渐失。而列宁的思想在苏维埃领导的民众中渐渐地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回应。

面对软弱无能的临时政府，急于求成的革命思潮，大肆泛

滥的群众自发势力和由此生发出的破坏文物、私刑、草菅人命等恶行，深知俄国国民性之优点与缺点的高尔基倍感忧虑。他认为，由于沙皇专制与剥削制度对俄国人民的长期毒害，俄国人民尚未成熟到能够正确运用自由与民主的程度。他写道：“自由与正义的最可怕的敌人就在于我们自身，这敌人就是我们的愚蠢，我们的残忍和全部黑暗与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他担心无政府状态将吞噬来之不易的自由，他在同后来任捷克总统（1918--1935）的学者托马什·马萨里克的谈话中曾指出，对于俄国来说，进行深远的社会主义变革的时间尚未到来。

令人意想不到的，列宁以其策略家的天才展开了巧妙的工作。他在说服了一定数量的中央委员后，于10月主持召开了社会民主工党（布）的中央委员会会议，21名委员中的12人参加了这次中央全会，由于该党长期处于地下状态，所以中央全会只要有半数以上中央委员参加就被认为有效。会议以10票赞成、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列宁的武装起义纲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10个人的主张决定了未来俄国的命运。紧接着，列宁与托洛茨基等人通过这时已控制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党团提议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因为革命军事委员会是在苏维埃的框架内选举产生的，这样，列宁实际上也就具备了调动苏维埃领导的千军万马的能力。于是就爆发了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苏维埃夺取了国家政权，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政府。激进革命的浪潮很快席卷了彼

得格勒、莫斯科等中心城市，并迅速推进到全国各地。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借助着革命浪潮把社会主义的理想公开地传播到俄国城乡，并尽力按照他们的理解试图实现这一理想；另一方面，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不赞同极端路线的党派、民众，以及他们的武装纷纷起来顽强而激烈地反抗新政权。俄国社会进入了历史上第二次大混乱时期（第一次大混乱时期是伊凡雷帝死后的约30年间），而新政权的领袖们对时局的分析、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及其实践社会主义的措施也都难免有错，其主要错误有以下几点：一、迁就群众自发势力；二、破坏了以苏维埃形式结成的统一战线；三、误认为俄国革命将点燃欧洲与世界革命的烈火。例如，十月革命在几个大城市取得成功，为了巩固与扩大胜利，布尔什维克向全国派出宣传员去鼓动群众，而宣传内容竟被通俗地简化成了“抢夺被抢夺去的东西”。再如，苏维埃政权虽在十月革命后立即颁布了《土地法令》，并答应尽快召开立宪会议，但由于因袭了临时政府的国家粮食专卖制度，强行解散了立宪会议，而加剧了自己与农民和其他革命政党的矛盾冲突。另外，十月革命后欧洲各国并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俄国新政权不仅没有获得预期的国际支持，反而因与德国缔结的不平等的“布列斯特和约”遭受了军事、外交、财政与道义上的巨大损失。所有这些错误都极大地加剧了时局的混乱。一时间，偷盗、抢劫、私刑、杀人等刑事犯罪蔚然成风，饥馑、战乱、排斥道德与文明等社会灾难，威胁着每一个俄罗斯人的生命，也威胁着俄国社会与苏维埃政权



的生存。

这时的高尔基面临着更为艰难的“怎么办”的选择：继续批评布尔什维克与他们领导的广大民众？那就会被革命阵营视为叛徒。放弃批评他所看到的布尔什维克与革命大众的错误？那又无异于帮助反革命阵营利用这些错误伤害和打击无产阶级。高尔基的做法是继续批评。他写道：“我坚信，如果第一个说出这些实情的是我，而不是人民的敌人，那对人民要好得多。”他更为紧张、深入地观察与思考，继续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专栏里发表自己精神劳动的成果。他在愤然驳斥反革命阵营对革命大众的污蔑与攻击的同时，坚定地实践着“永远批判一切压迫人的制度”的原则：他反对革命领袖谄媚民众，反对将阶级论庸俗化而扩大民众之间的杀戮；他抗议布尔什维克不守政治信义解散立宪会议，反对镇压支持立宪会议的工人与士兵；他捍卫言论自由，谴责新政权继承沙皇查禁反对派报刊的作法。另外，他还竭力从正面影响苏维埃政权，希望它尊重知识与知识分子，发展全俄的文化与启蒙工作，引导工农大众用科学文明和道德反对愚昧与不道德，开创健康、光明的俄国社会新生活。在高尔基紧张观察、思考和言说的时候，他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与打击：他出自良心的呼吁成了无人响应的旷野呼喊，他对革命阵营的“恨铁不成钢”的批评给他招来了粗暴的中伤与生命威胁。1918年7月16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查封了《新生活报》——当局不再准许持有不同观点的报刊出版了。

从1917年5月1日《新生活报》开始出版到它被查封的14个月中，高尔基共在该报上发表了约80篇文章，其中58篇发表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专栏之中。1918年高尔基将其中33篇收在《革命与文化——1917年论文集》中，由柏林的拉迪日尼科夫出版社出版。同年秋，作家还将其中的48篇以《不合时宜的思想》为名在彼得格勒结集出版。两本文集所收文章互有交叉重复，第一本按发表文章顺序排列，第二本按文章内容排列。1922年到1923年，高尔基打算在俄国重版《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并计划将《革命与文化》中的13篇补入其中，但未能如愿。在此后的六十余年中，高尔基的这些文章在苏俄国内再也没有出版过。因为据苏联官方文学史家称，高尔基后来曾多次承认并改正了十月革命前后的思想错误，所以人们也就不应该再去读《不合时宜的思想》了。

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在《新生活报》被查封之后，高尔基仍然不断地向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袖表达他对当局政策的批评与建议，并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阻止文物外流、赈救饥民、组织图书出版、保护知识分子等具体工作之中。为了做好这些工作，尤其是为了拯救被捕的人们，高尔基常常与列宁发生激烈的争吵。1921年10月，在诗人勃洛克因得不到及时医治而病故和诗人古米廖夫被枪杀之后，高尔基才按列宁近乎要求的再三建议出国治病，开始了他长达12年的第二次侨居生活。这时的高尔基已经不仅是列宁的“诤友”，而且是列宁的“畏友”了：列宁实在不愿再听这位人道主义作家在他身旁喋喋不

休地为那些“砍伐森林”时四处飞溅的“碎木片”喊冤叫屈了，而高尔基也似乎失去了影响列宁的信心。实际上，高尔基的第二次侨居生活也是他的自我放逐。

去国之初，高尔基过着半苏维埃官员半侨民的生活：一方面，他的饮食起居开销的很大一部分是由苏俄政府出资的；另一方面，他对苏俄政府一系列政策的态度与许多“白俄”侨民相似。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苏俄政权的日益巩固（布尔什维克在内战中的胜利、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等），国内秩序渐趋稳定，高尔基对苏俄政府的态度也慢慢地缓和下来。而1924年列宁的去世无疑更加速了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和解过程。正如高尔基说的那样，在列宁逝世后他“心情沉重”，认为列宁之死是“百年来最大的不幸”，并立即写了回忆列宁的文章，还反复对它进行修改与补充。这就是1930年最后定稿的纪念长文《列宁》。

确实，在《列宁》中既有高尔基对已故领袖的深情怀念和真诚赞扬，也有对自己在十月革命前后思想的自我批评。然而，这只是词语层面上的，如果考虑到历史文化与思想层面，那问题就不这么简单了。首先，从小生长在俄国东正教文化氛围中的高尔基，成年后虽然变成了一名无神论者，但他的行为与思想依然保留了许多东正教的传统。而按照东正教的规矩，对于逝者是只应讲其好处，不宜讲其坏处的。其次，自罗蒙诺索夫开始，俄国作家在描写本国元首时都有“歌德式”的古典主义“颂诗”传统。这里所说的“歌德式”绝无阿谀谄媚之

意，而是指作家在为记述的对象及其后人树立理想的楷模，敦促他们按作家认定的方式治国安邦。考虑到列宁去世后苏俄党内斗争日益加剧，社会动荡频仍和1930年前后导致一千万人饿死的全苏范围的大饥荒，高尔基在《列宁》中极力颂扬的他的友人兼领袖的朴实、高瞻远瞩、与人民的紧密联系，为人民的福祉而奋斗的精神，正是高尔基认为当时苏联领导人应有的品德。在30年代斯大林那种深居简出、工于心计、刚愎专权的生活方式与工作作风的映衬下，高尔基笔下的列宁所具有的平易、坦率、民主气自然格外可贵。这也是高尔基之所以会在数年间创作并不断修改《列宁》这部作品而不愿为“主人”（一译“老板”，苏共上层对斯大林的代称）写一篇传记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在《列宁》中高尔基实际上是重申并坚持了他当年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例如，他再次声明“新一代的革命的重要任务就是创造能够建设国家的文化力量发展的各种条件”；他依然认为十月革命是群众自发势力的爆发与泛滥。他甚至断言，在十月革命后列宁“好像是同意了这一点：实际上，革命正是在那过时的和狭隘的条件下找不到正常发展机会的精力爆发”。在《列宁》中，高尔基还记述了列宁对三个科学院院士的评价及曾帮助一名反对过革命的将军的实例，并以此向人们证明：后来，在对待文化，尤其是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不是他向列宁，而是列宁向他靠拢了，认识到了只有联合起知识分子这些“聪明人”，这些“阿基米德们”，善待他们，支持和帮助他们的工作，“我们”才能让世界“翻个身”。

事实上，1921年以后列宁在制定与实践新经济政策时也确实在处理革命与文化的关系上作了重大的调整，在许多方面应和了十月革命前后高尔基的那些“不合时宜的思想”。

1928年，高尔基在阔别祖国7年后首次回到苏联。毕竟他与苏共是同属一个革命阵营的。从此，高尔基开始了他人生最后阶段的生活。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高尔基既体会过目睹在他面前展示的工农当家做主之图景后的感慨与欣喜，也品尝过洞悉弄虚作假的“波将金村庄”之真相后的困惑与失望；既得到了全苏第一作家的风光待遇，也经历了作品被当局肆意删改的屈辱与痛苦，既为俄罗斯文学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无可替代的贡献，也曾自觉不自觉地“为主人”的个人崇拜唱和、鼓吹……不过，近二三十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关于“高尔基作为斯大林的文化代理人败坏了俄苏文学”的说法，显然有失偏颇，因为在苏俄社会文化历史的那一阶段高尔基和斯大林虽然都属于左派阵营，但前者是主张民主的左派，而后者却是比他还要左的左派，即转向独裁的左派。也正是因为有着这种区别，高尔基尽管有17年布尔什维克的党龄，但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却并没有办理党员登记手续，而且直至逝世也没有再重新加入苏共。高尔基一生的思想与实践始终如同撰写《不合时宜的思想》时一样伟大而深广，矛盾而复杂。

1994年，我们就译完了《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经林贤治先生相助，得于199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江苏人民出版社出了另一版本。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